

金、资、光、贵的斗争

陈 仁 洪

1936年7月上旬，邵武战斗失利后的二纵队，重新回到朱坊一带，作短期休整。

部队在这里又补充了一些兵员，记得当时我们支队还吸收了一个教书先生参加红军，此人能说会写，后来编入新四军时，担任我们五团二营五连指导员，后离队。

这期间，7月的一天，曾镜冰同志以省肃反代表的身份在部队中处理一些连、营和支队级干部的问题，从当时的情况判断，看来主要是处理浙西南过来的同志。

这里先介绍一个情况，1935年春天，刘英、粟裕同志将怀玉山突围的部队组成挺进师经闽北挺进浙西南以后，在浙赣线以南的仙霞岭一带，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1935年8—9月间，由于浙西南斗争环境比较恶劣，活动在江山、龙泉一带的挺进师四纵队，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在王德义的带领下，纵队300多人暂时撤到闽北方面来休整。这支部队的前身是红三军团，绝大部分是江西兴国人，他们是从中央苏区过来的，不少同志资历、文化水平、斗争经验都比较好，是当时战斗力比较强的一支部队。中共闽北分区委根据当时的斗争需要，把挺进师四纵队留了下来，编为闽北二纵队，原挺进师四纵队的王纵队长，任二纵队队长。与此同时，也提拔使用了不少文武兼备的干部担任二纵队的领导职务。如当时

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张××，也是原浙西南挺进师四纵队的同志。编为二纵队的三支队，在黄立贵同志的率领下，与大家一起挺进到邵、建、顺苏区。在大半年时间接触中，我感到这些同志思想和政治水平都比较高。他们当年在中央苏区受过比较正规、系统的教育，后来在方志敏、粟裕、刘英等同志的领导下，参加抗日先遣队挺进赣东北、皖南，经过无数次战斗的考验，他们虽然不十分愿意留在闽北，但是既然留下，战斗中无不英勇顽强。由于部队建制联系上的原因，他们当中部分同志流露出对闽北的离异，对浙西南挺进师的回归思想以及对从中央苏区到赣东北的丰富经历所表现出来的骄傲自满情绪，这些按说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无非是个教育引导的问题。但在当时，都被视为是“改组派”、

“AB团”的行为，结果挺进师四纵队过来的不少干部先后被处决。最初被怀疑的是三支队队长黄道福同志，领导找他谈话之后，认为问题严重，结果在战斗中，黄道福便有意站在阵地上暴露自己，等着敌人开枪把自己打死。这种被逼变相自杀的现象，在当时并不少见。一些蒙受冤屈的同志认为，如此让自己的组织怀疑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如在战场上与敌人战斗到底死得光明磊落，所以一旦被审查，便采取这种不应该采取的办法。黄道福同志牺牲后，纵队部机枪连连长童景瑞同志接替了三支队长的职务，但是没过多久，童又被怀疑。

一次战斗刚刚结束，童景瑞同志突然被押了起来，先关在一家老乡的竹楼上听审。童自知有口难辩，便决计逃走。他被关的这幢竹楼，后面紧靠一座毛竹山，楼房是靠山坡盖起来的，楼上的后窗口，恰好有一座用毛竹搭成的“小天桥”，通往后山，后面就是黑沉沉的森林。童景瑞同志想，呆在这

儿，用不了多少时间，不是屈打成招，就是有口难辩，反正说不清楚。但这样自己屈死不算，留下的还是骂名，如其这样，不如逃出去，留得这条命，算是本钱，也许日后能为革命再出力；逃不出去，怨自己倒霉，只能听天由命。他主意一定，这天中午，就趁看押的同志下楼吃饭的机会，用头顶开窗门，因为反绑着双手，行动起来很不方便，好不容易蹭出窗口。轻手轻脚地越过竹桥，飞也似地跑上后山，钻进树林，当后面响起追赶他的枪声时，他早已消失在丛山林海之中。他走近一块大石边，用力将绑扎在自己手上的绳子磨断。为了摆脱追赶，他含着眼泪在山里面狂跑，跑向哪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童景瑞是从家乡跑出来参加革命的，现在他又从这个革命队伍中跑出去，他不愿意跑，舍不得跑，但眼下又不能不跑。他一边跑，一边想着，跑回家，那不等于在革命路上半途而归吗？跟父老乡亲怎么说？不成！跑向其他红军队伍，武器都没有了，这样狼狈不堪，又怎么说得清楚！跑到敌人那边去吗，自己压根就不是这种人，不干！他这样一边跑一边想，一下子便跑了30多里路。童景瑞逃走以后，队伍摸不清真相，认为出了叛徒，赶紧疏散隐蔽，防止敌人反扑，结果一直呆了3天，不见任何动静，大家才领会到冤枉了童景瑞同志。

再说，童景瑞跑着跑着，眼看太阳就要落下去了，林子里渐渐黑下来，他又饥又渴，一个人在大山里徘徊，头一次感到那么孤独，真想大哭一场，但又哭不出声来。他也想到死，但又觉得作为一个红军战士不应该轻生，他甚至想，干脆再跑回去，让组织处理，也许有那么一天能沉冤昭雪，死也瞑目了。他在山里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前面半山中有一座寺庙，白墙黑瓦，鳞樟龙柏，走近一看，因为年久失修，

庙墙已经斑驳。他想，不管怎样，天也黑了，先进去歇息一下，再作打算。他急匆匆地沿着台阶攀援而上，叩一下紧闭的门，不一会走出一个小和尚来，一边打量着他一边问道：

“是什么人？天这么晚了，还敲门？求佛事明天再来吧。”说完便要关门，童景瑞赶紧上前一步，说道：“我是好人，今日落难，走晚了，求发慈悲，留我住一宿吧！”小和尚隔着门缝观看了一会，说道：“你是好人？”“是好人。”童仰起脖子让里面的人看了看自己。小和尚沉吟了一会，说道：“你等一下，待我跟师父禀报一声，留你便好，不留你就快些下山去寻找住处，免得夜深人静，告宿无门。”“那好，那好。”小和尚去了一会儿，便回来开了门，把童引到一个长老跟前，长老仔细地端详着童景瑞，见他一双粗壮结实的大手，浑身显露出一种掩饰不了的质朴倔强的气质。他招呼童坐下来，叫弟子送上一大碗饭说道：“佛门以慈悲为怀，你今日有难，没有不留之礼。只是战乱遭祸，寺中香火不畅，清苦得很，势必怠慢，你若不嫌，不妨留在寺中歇息几日，再作计宜。”童景瑞没想到长老如此大度，连声道谢，就这样在庙里住下了。住了几日，童景瑞想眼下也没有去处，不如干脆在庙里呆一段时间，以后再找队伍。于是他向老和尚请求容留，因庙里正缺人手，老和尚见其耿直肯干，不胜欢喜，欣然同意留下，从此庙内农桑洒扫之事全由童一人包了下来。

这样，一直呆了近一年，后来听说国共合作，整编新四军，童景瑞同志才从山里出来，只身跑到江西石塘找到部队，被编在三支队五团二营任副官。他作战勇敢，正直坦白，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又为党作出了很多贡献。所以童景瑞同志每次跟我说起“邵、建、顺”的这段经历，总有难言之隐。

7月下旬，一天，刚吃过早饭，黄师长派人叫我去一趟，说是重要任务。我急忙去纵队部，走进黄师长的房子，见曾镜冰同志也在场，寒暄了一阵，黄师长让我坐下，认真地说：“陈仁洪同志，这次我们交给你一个任务，你一定要想办法完成。”我说：“没有问题，请师长说吧。”黄立贵同志接着说：“任务是两个方面：一是，明天曾主任要回省委，走的时候还要带几个人，你要把他们护送到省委，保证他们路上绝对安全。”我的心“咯冬”一下，曾主任这次来“邵、建、顺”，是专门搞肃反的，要带走的人肯定凶多吉少。“你看有什么困难吗？”黄师长见我迟疑了一下接着问道。“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我抬起头来回答。“那好，第二个任务是，明天你走的时候，把你们一支队的部队精减一下，带300多人，护送曾主任回闽北以后，到资（溪）、光（泽）、贵（溪）苏区找吴先喜同志，他们那儿斗争很紧张，正需要人。”说到这里，黄师长停了一下，用眼睛盯着我又说：“三分区那边很困难，吴先喜、鲍永泉同志去了以后，攻打过资溪县城，结果没有站稳脚跟就引来敌人几十个团的围攻，在五里峰战斗中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听说吴先喜同志也负了伤。现在，江西方面的敌人天天‘清剿’，他们已经分散隐蔽，你们去了以后，要多加小心。联系得上，就在吴先喜同志领导下，与四纵队一起坚持当地斗争；联系不上，再回到‘邵、建、顺’来找我。”我沉思地不时点着头，黄师长鼓励我说：“独立师成立以来，你们支队基本上自己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相信你能克服困难，完成好任务，协助四纵队巩固资、光、贵苏区，坚持斗争。”说到这里，话锋一转，黄师长又说：“如果实在坚持不住，组织上也不会怪你们，你再回来，把部队带向西南方向，我下一步可能在将乐、泰

宁一带开辟新区。”听完黄师长的交待，我站起来表示决心：“请师长放心，不管环境多么艰苦，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会坚持下来，今后很可能联系不便，请师长相信我们的党性。”黄立贵同志高兴地点了点头，痛快地说：“也好，你赶快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拂晓出发！”听说要到三分区找吴先喜同志，我心里很高兴，是啊，自从甘溪大捷以后，再也没有同吴先喜同志见过面， he 现在是闽北军区司令员兼第三分区司令员、政委。又听黄师长说他已负伤，真是焦急万分，恨不得马上见到久别的老首长。

第二天，天刚亮，战士们很早吃了饭，集合待发。这时候，王纵队长的警卫员吴长武突然喘嘘嘘地跑来告诉我：“陈政委，不要急，黄师长要送你们哩！”我刚把队伍整理好，黄立贵同志便大步地走过来了，他先看了大家一眼，接着站到一块高地上，亮起嗓门讲开了：“同志们！近一年来，你们为邵、建、顺苏区的恢复、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你们一支队开赴资、光、贵苏区，支援抚东分区的斗争，这是党交给大家的光荣任务，我们相信你们能够出色地完成！祝大家一路顺风，马到成功！”战士们热烈地鼓掌，喊起了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向敌人讨还血债！”、“坚决完成战斗任务！”

队伍开始出发，我向黄师长行了一个军礼，他伸出粗壮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再一次叮嘱我们一路上多加小心。“放心吧！师长。”我一面回答着，一面看着黄师长消瘦脸庞上的那双明亮坚定的眼睛，心里想：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好“资、光、贵”的斗争，接受你的检查。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向黄师长挥手，没想到，这就是我同黄立贵师长的最后一次告别。

队伍走出村口，曾镜冰同志带着纵队政治部的张主任、严特派员、郭医务主任，还有一个宣传队长（名字记不清了），从另一条小路上插进队伍。我赶上去，不好多问，大家彼此简单说了几句话。这些人都是原来三军团的，去年从浙西南挺进师四纵队刚刚过来，年龄和我相仿，文化程度比较高，又都是江西兴国人。平时在一个部队，都很熟，很要好，经常在一起开玩笑，现在只能相对无言，默默地各自走路。曾主任很少讲话，他们4个人脸色都很难看，我不清楚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被带往闽北。后来才知道，他们到了闽北以后不久，便被处决了。

8月的闽北，骄阳当空，热气逼人。送曾镜冰同志走到五里山，因为接近省委驻地，我们便分了手，队伍沿着光泽、资溪交界处的大山艰难地跋涉。这一带都是白区，我们边打仗边行军。

9月初，好不容易翻过武夷山主脉进入江西境内。不久，我们到了冷水坑附近，原想能很快找到游击队，但是来到这里，情况非常紧张，国民党采取“移民并村”的政策，小的村庄都并到大村去了，每个大村都驻有几十到上百人的民团武装，小的村子房屋被烧毁、拆掉，只留下断垣残壁，稻田无人耕种，杂草丛生，地面龟裂，群众被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圈在大村子里。群众上山干活都由民团统一组织，没有行动的自由，因而部队难以接近群众，更难打听到吴先喜他们的下落。我们在山里转了几日，仍不见有人前来联络，抓到敌人的几个“舌头”，也只说自从元月份在五里山打了一仗之后，再也没见游击队的踪影。怎么办？县委和游击队的同志肯定转入了隐蔽式的斗争，贵南这一带山区，峰峦连绵起伏，我们初来乍到，人地两生，找起来确实很不容易。

日复一日，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很是着急。后来，一连长提议说：“咱们找不到县委，为什么不让县委来找咱们？”我说：“怎么找法？”他说：“只要我们呼呼隆隆地打上几仗，那就象贴海报一样，用不了几天，山里山外准知道，只要消息一传到游击队那里，他们自然会派人来联系的。”我听他说得有道理，便补充说：“那好，要打就打有影响的地方，就打冷水坑的民团。”

冷水坑地处资溪、贵溪两县交界，是江西敌人对付金(溪)、资(溪)，光(泽)、贵(溪)红军的重要支点，这里驻有国民党地方保安武装一百多人，村子傍着河岸，形成长条形，平时大部分敌人住在街上，少数住在西边山上的碉堡里。7月以后，这一带游击队就没有什么大的活动。国民党为了欺骗群众，也欺骗自己，到处造谣说，资、光、贵一带的红军完了，致使这里的敌人都很麻痹。我们先用一个排的人化了装，趁敌人午休的时候，突然冲到街上，一些敌人正在树底下打牌玩，突然见到这么多红军出现在面前，一个个连滚带爬地往房子里钻，战士们端着枪紧追不放，机枪、手榴弹在敌人堆里开了花，不一会，冷水坑被打得烟雾腾腾，鬼哭神嚎。

躲在碉堡里的敌人，见山下打成一片火海，急忙用机枪火力增援，“哒哒哒”机枪声震动着整个山谷，我们在街上横冲猛击，只听到敌人的子弹呼啸而过。于是，我们赶紧撤进房子里，这下敌人拿我们没办法，只听到屋瓦被子弹打得“哗啦”作响，不一会，村子里的几十个敌人很快被我们解决了。碉堡里的敌人不敢下山，只能一个劲地往街上瞎打枪。我们没有去理它，顺便又抓了几个土豪，打开他们的粮仓、商店，将粮食、布匹分发给受苦的群众。

几个小时以后，街上的战斗结束，我们准备撤出冷水

坑，因为进出冷水坑，只有一条狭长的街道，碉堡里的敌人见我们要撤，就迅速集中火力封锁街口，部队一时受阻，大家蹲在墙脚下，看着敌人把街口的开阔地打得尘土飞扬。部队不能困在这里，万一敌人的增兵赶到，处境将很危险，我大声吆喝：“轻机枪，赶快把碉堡的火力压下去！”结果，因为敌人居高临下，我们的射击位置不利，机枪手刚刚把轻机枪架起，就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这时，大个子机枪班长朱少武，瞪大愤怒的双眼，一下子端起了轻机枪，对着大碉堡的射击孔就是一梭子。他原是国民党七十二师一个特务班的班长，因为同情革命，1935年在邵武集体起义参加红军，由于他在战斗中表现英勇，且身材高大，力气过人，便当了机枪班班长。他端着机枪边打边撤，一梭梭子弹准确地飞向敌碉堡的射击孔，打得敌人一直没抬起头来，不一会，部队便全部撤出冷水坑。

冷水坑一仗，威振四乡。小股民团不敢肆意妄为，纷纷撤到大镇子里集中起来，我们又趁势在这一带打了一些土豪，一度消沉的群众情绪又高涨起来了，到处宣传“游击队没有被消灭！”、“闽北的红军又过来了！”

过了几天，我们正在吃饭，山下一个老表带着一个便衣人员找到我们，来人一见到我，便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心县委的交通员，吴书记有信给你们。”说完，他摘下戴在头上的斗笠，从竹篾的夹层中抽出一张卷得很细的字条，我接过字条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两行字：“接信后，部队原地待命，指挥员请随去人来一趟，详情面谈。”落款是吴先喜。这时，我高兴极了，资光贵中心县委终于联系上了。当天，我把部队带到洞源附近，让大家隐蔽待命，并叮嘱，我未回来之前，不得组织任何战斗。然后，便随县委交通

员向北走了三四里路，来到一个叫板石坑的村子。这个村子四面环山，周围都是茂密的森林，交通很不方便，地形比较隐蔽。交通员没有带我进村，却沿着村南的山坡一直往竹林子里走，翻过山头，在山的南坡见到一个毛竹棚，不等我们走近，吴先喜同志已经从棚子里走了出来，左胳膊还吊着绷带。他见到是我，便大声呼喊起来：“啊呀呀，陈仁洪！原来是你来救驾！”自从甘溪大捷，我再也没见到吴先喜同志，他那方方的脸上消瘦了不少，头发也留得很长，我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吴先喜同志急忙把我领进棚子，急不可待地问道：“快说说，你们过来多少人，闽北的情况怎么样？”我把邵、建、顺苏区和黄立贵同志临时交待的任务详细作了汇报，同时讲了进到金（溪）、资（溪）、光（泽）、贵（溪）苏区以来，寻找中心县委的情况。吴先喜同志轻轻抚摸着伤臂，简要介绍了5月以后他和鲍永泉同志来到金、资、光、贵苏区的情况。

原来，洞宫山会议之后，黄道同志偶然在敌人的报纸上发现了刘文学同志仍带游击队在资、光、贵一带坚持斗争的消息，于是便派吴先喜、鲍永泉同志率四纵队到这一带寻找刘的游击队，经过几番周折，两支隊伍终于在闽坑附近会师。此后，根据省委岚谷会议的指示精神，撤销了原来的中心区委，扩大成立了资光贵中心县委，由吴先喜同志任书记，刘文学同志任副书记，鲍永泉同志任组织部长，与此同时，成立了抚东军分区，吴先喜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鲍永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中心县委成立以后，刘文学同志主要做地方工作，部队由吴先喜、鲍永泉同志指挥，四面出击，打击敌人。

6月份，部队转到资溪县附近，发现城里很空虚，只有

为数不多的民团把守，当时四纵队里有个叫张文华的人极力主张打进城去，说这样影响大，对红军的声誉有好处，听了他的意见，纵队就决定攻打县城了。其实这是缺乏全面考虑的，因为当时刚刚成立的四纵队只有二三百人，人少力薄，脚跟还没有站稳，需要在敌人夹缝里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再说金溪、贵溪一线集结了国民党大量的保安团和地方民团，他们虎视眈眈，只要红军一露面即刻扑击。果然不出所料，部队刚刚打了资溪，一天，江西敌人便纠集了十八个团的兵力蜂涌而至，杀气腾腾地到资溪一带进行大“清剿”。吴先喜带领部队冲出包围，撤到金溪五里峰又陷入敌围，经过激战，伤亡人数达三分之一，而张文华却叛变投敌。吴先喜、鲍永泉等苦战冲出重围。就在这次战斗中，吴先喜同志负了重伤。后来被打散的部队由鲍永泉同志收拢起来，仅剩百把人，而敌人又不断搜山捉人，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这样，部队不能集中活动，便拉到外线休整，吴先喜同志由中心县委秘密转到板石坑一带隐蔽养伤。

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向吴先喜同志请示部队的任务，吴先喜同志说：“今后，你们就在四纵队的领导下进行战斗，等鲍永泉他们回来，你再来一下，咱们再开一个会。”他停了一下，提醒我说：“你们打了冷水坑，肯定要引起敌人警觉。部队不要老集中在这一带，可以拉到外线去搞些活动。”

从吴先喜那里回来以后，我派人给他们送去一些药品、粮食和其他一些吃的东西，便把部队拉到了天台山附近。不久，鲍永泉从光泽一带活动回来了，两支队伍胜利会师。这时我想起了吴先喜同志的话，便约鲍永泉同志一起去看他。走到那儿，恰好吴德初同志也在，几个人便在吴先喜同志养

伤的竹棚里临时开了个会。会上主要是吴先喜同志讲，决定以我们支队为主力，在原来四纵队的基础上进行组编，并任命吴德初同志为纵队长，吴先喜同志兼纵队政委，鲍永泉同志为纵队政治部主任。我们一支队改为四纵队一支队，我仍任一支队政委，原四纵队的部队，编为另一个支队，继续坚持金、资、光、贵的斗争。

这次扩编，四纵队连同贵南游击队及地方武装，大约有六七百人。吴先喜同志讲：“新扩编的四纵队，要以分散灵活的游击战术开展对敌斗争，现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们要慎重出战，尽可能地保存和不断壮大我们的有生力量。”他还说：“反‘围剿’时，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可以指挥蒋介石，牵着他的鼻子走，我们虽不能指挥国民党的大部队，但是能够指挥调动他们的民团小部队也好嘛。大家要主动出击外线，把国民党部队牵出去，使他们搞不准我们究竟在哪儿，这样也就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地方党可以趁此机会加紧武装群众，发展组织，巩固我们的后方。活动可以按二十天到一个月为一周期，打出去，搞些情报和物资就回来，休整几天再打出去。如此循环往复，我们的雪球就会越滚越大。”

根据吴先喜同志的要求，四纵队组编不久，我们便采取长途奔袭的办法，打了光泽县的华桥民团。华桥位于光泽县城西，离县城30余里，地处白区中心，以往很少有红军去活动。我们利用敌人不意这个特点，事先找好向导，部队从下午出发，披星戴月，一夜之间长途奔驰一百多里山路，天不亮便冲进村子，全部消灭守围的民团，又抓到十几个土豪罚款。这是我们四纵队集体行动的第一仗。此后，两个支队便分头行动，不断在白区和根据地之间来来往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利用同我党进

行停战议和的烟幕，玩弄“北和南剿”的政治伎俩，重新集结部队进攻我南方各游击区，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游击队，解除心腹之患，以集中精力对付陕、甘、宁边区。江南所谓“剿匪”机构也撤换人马，刘建绪接替张发奎，就任闽、浙、皖、赣四省“剿匪”总指挥。他们纠集陈光中六十三师，戴民权四十五师，以及原驻邵武、光泽、黎川、贵溪等地的敌三师、十六师、五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八师，和许多地方保安团，重新布置“围剿”计划。悬赏、缉拿各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如对黄道、黄立贵、吴先喜等都以二千至五千元赏金，布告四乡缉拿。敌人预感到1937年政治局面即将转变，迫不及待地大举“清剿”，一时间杀气腾腾，剑拔弩张。

当时，闽北红军对这种形势缺乏了解，没有思想准备。政治上没能及时地提醒、教育部队，作相应的思想转变；组织上没有注意更好地保护中、高级指挥员；军事上满足于游击作战的顺利发展，麻痹轻敌，在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前，没有适当避其锋芒，致使闽北党和红军游击队又一次濒临危境。

1937年初，我们在白区活动，与敌人打了一次遭遇战，部队受了一点损失，一些刚刚扩大来的战士害怕残酷的战斗，偷偷地开小差回家了。他们回家以后，为了减轻地方党和群众对他们的批评责怪，便到处宣传说，仗打得不好，部队被打散了，他们是找不到队伍才回来的。中心县委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对我产生了怀疑，实际上是对我与原浙西南四纵队粟裕部下的关系有偏见。前面已经说过，1935年秋，闽北独立师分兵时，当时把我们营和浙西南挺进师过来的四纵队编在一个纵队，说起来我算是地道的老闽北。因为当时

挺进师四纵队被编进闽北独立师二纵队时并不情愿，所以把我们编在一起，想起点监督作用。后来在与浙西南四纵队这些同志的接触中，大家一起战斗、学习、交流思想，慢慢地感情也就加深了，思想上也没有什么隔阂，朝夕相处，说说笑笑，无拘无束。当时我觉得，虽说部队建制来源不同，但都是红军，都在为革命出生入死，有时可能有点思想问题，但是只要谈得通，没有必要搞得互不信任。由于我与浙西南的同志来往比较密切，闽北的一些领导同志，便怀疑我不是去掺沙子，而是被浙西南的同志同化了，于是对我不满意，借着这次作战失利，开始审查我。最初，有一位领导同志找我谈话，他说：“部队为什么有人开小差？”我说：“仗没有打好，士气受到一些影响。”“为什么别的部队没有开小差的？这是你指挥的责任，你好好检查一下你与四纵队的思想行为。”说完转身就走了，我当时感到莫名其妙。

第二天，纵队政治部主任鲍永泉同志又找我谈话，除了讲到这次战斗失利以外，进一步引导我说：“你对四纵队粟裕部下有什么看法？”我不加思考地回答：“他们文化程度比较高，政治水平也比较高，比我们知道的多。”鲍提醒我说：“你不要说了，你可知道，曾镜冰带去省委的张主任、严特派员、郭医生等被认为是‘改组派’，被杀害了，你也被怀疑是‘改组派’了，你还说这些，是要杀头的。”我说我不是“改组派”，倘若是，还能干到现在吗？鲍永泉同志也被怀疑是“改组派”，对我眼下的处境是理解的。他见我争辩，没说什么，只是提醒我以后多加小心。我表示说：“这次仗没有打好，给什么处分都行，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有继续考验我的机会，干什么都可以，我一定干好！”

鲍永泉同志回去汇报，后来告诉我，撤销我支队政委职

务，由支队号长余信文接替我的工作。当时，我虽不是政委却仍随部队活动，一旦部队遭到损失，还要我负责，叫做“无职有权”，说是对我“以观后效”。我心想，只要有革命的机会就行，撤职不撤职没多大关系。不久便又带上队伍向白区行动。我们先用长途奔袭的办法打了将乐附近的华桥，消灭了包括民团团长的在内的50多个敌人，缴了一些枪，筹了不少款。这样过了4个多月，到1937年4月，由于我们几次战斗都打得不错，连续缴获了一些东西送回根据地，部队不但伤亡很少，还扩充了几个人。纵队部说我表现还不错，又恢复了我的职务。

5月以后，形势进一步恶化。敌人在不断组织正规部队有计划搜山的同时，还通过各县举行壮丁总动员，“清剿”我军，他们的基本办法是四条：一是组织乡村通讯队，侦察本村方圆十至二十里间的红军零星游击队，发现踪迹，迅速报告；二是组织乡村“守望队”，在本村昼夜巡逻守望，一旦发现红军进村，夜晚举火，白天鸣金，并严格盘查过路行人，行迹可疑的扣下；三是秘密组织特务人员，特务组主任直接受县长指挥。他们扮成各种生意人，秘密串乡，搜集了解各村“守望队”掌握的情况；四是严厉惩处窝藏缴款和剿办不力的官兵。

一天，中心县委突然派人通知我们去上源开会。来到那儿，见到鲍永泉同志眼睛已是红红的，一问才知道吴先喜同志牺牲了，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到会同志忍不住声泪俱下。吴先喜同志是在光泽柴家活动时，被敌人重重包围，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他的死，使闽北党和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真叫人痛心不已。

当时，根据这种情况，中心县委决定由吴德初同志带上

四纵队的大部分人，去闽北向黄道同志汇报，其余的人留下坚持当地斗争。我带一支队与鲍永泉、谢忠厚等在上源、下源为中心的金、资、光、贵一带活动。会议确定斗争的总方针是：“就地坚持，保存有生力量，适时消灭敌人，等待中央红军回来。”

形势变化了，我们的对敌斗争策略也作了较大的转变。例如，以前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没有了政权，也缺乏足够的武装来保护人民得到的胜利果实，有时往往今天刚分了田，明天国民党军队来了，地主土豪们又把地夺了回去。时间长了，许多群众害怕敌人反攻倒算，红军给他土地，他们也不要。这样不但鼓舞不了群众斗争热情，相反还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因此，在这期间我们便只把打土豪缴来的现成东西分给农民，例如分米、分布、分盐等东西，有时还率领群众到地主、土豪的山上伐树、砍竹，运到集上去卖钱，换回生活必需品。敌人来了，群众手里这些东西也消耗光了，地主们弄不清谁家得了多少，对大伙也没有办法。这样一来，群众的斗争热情又高了，他们更加爱护、关心、帮助自己的红军。有时上山干活，他们偷偷地带米上山送给红军；有时则穿着衣服、鞋子上山，下山时，把鞋子、外衣故意丢在山上留给红军穿；敌人强迫群众带路搜山，他们便故意往没有红军的空山上带，搞得敌人疲惫不堪。

在对敌人的打击面上，也大大压缩，注重分化瓦解、教育利用。譬如，过去凡是民团、地主、保甲长，不管能不能争取，一律都是财产没收，结果把敌对分子搞成一团，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增加了我们斗争的困难。现在，我们尽量采取争取、利用的办法，不管是民团、地主分子，还是保甲长，只要不是死心踏地坚持与我为敌的，不进行财产没收和人

身打击。当时还给他们规定了六项条件：(1)不向白军报告红军的消息，要报告，等红军去了一天或两天，再去，而且还要虚报红军的人数；(2)白军来围攻时，要提前送消息给红军；(3)不能给白军带路，要带路只能往没有红军住的地方带；或者等红军转移以后再往那儿带；(4)要送粮食给红军；(5)必要时帮助红军安置伤病员，并以身家性命保证我伤病员的安全；(6)不得欺压群众，捐税要少派。采取这些灵活的政策，争取、利用了许多地主、民团、保甲长，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例如，有时被敌人追得实在走不出去，我们便往地主大院里钻，地主知道红军杀不完，就设法保护我们。战士们在作战中负了伤，有时没有条件往群众家里藏，干脆就抬到大户人家，他们不敢怠慢。抓到民团的团长，我们也不杀，让他们利用其合法身份，给我们做军衣、买鞋子、手电和药品，大都能按时办到。当然，也有个别反动的，不守信用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决不放过，不管他怎样东躲西藏，总会使他得到应有的下场，这样更加维护了我们政策的严肃性。

正是由于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斗争策略，金、资、光、贵苏区的群众才在吴先喜同志牺牲以后，面对敌人的重兵“清剿”，还能顽强地生存下来。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国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一心反共的国民党蒋介石仍旧顽固地限令要在7、8、9三个月消灭闽北红军，继续向各游击根据地大举进攻。

7月下旬，马长炎同志带领一百多人，从将乐一带过来，在冷水坑附近与我们会师。他说了邵、建、顺、将、泰苏区的紧张情况，并告诉我们，7月13日黄立贵同志从顺昌到崇安在找黄道同志的途中，在邵武洒溪桥以北的山里，